

戒嚴初期雜誌譯者的角色

張綺容

戒嚴初期（1949—1955年）是臺灣從親日轉向親美的轉捩點，也是身分認同從大和遺民轉向中國移民的過渡期。在美蘇冷戰與國共鬥爭的歷史框架下，論者大抵認定國民黨政府視文藝為建立民族國家的宣傳手段，官方文藝政策主導文壇、反共文學應運而生，政府支持的文學團體紛紛成立，同時國營事業單位相繼創辦雜誌作為發表管道，刊行的各類創作為過往研究所聚焦，探討其意義與多重面向，從而勾勒出戰鬥文藝與懷鄉文學兩條軌跡，至於與這些創作並行的翻譯作品則罕見受到關注，既不知由誰翻譯？有何翻譯？亦不知如何翻譯？為何翻譯？本研究以臺灣戒嚴初期發行的36種雜誌作為考察範圍，從中選取翻譯篇數前十名的譯者作為研究對象，具體描述其翻譯作品和翻譯實踐，從而提出新的理解架構——以譯者為主體，重新反思官方文藝政策與主體實踐的關係，並論述譯者在戒嚴初期的重要性和影響。

關鍵詞：戒嚴時期、雜誌研究、譯者研究、臺灣翻譯史

收件：2023年9月23日

修改：2023年12月22日、2024年1月12日

接受：2024年12月11日

張綺容，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etitmarron218@gmail.com。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臺灣戒嚴初期（1949—1955）譯者群像：附譯者評傳」（MOST 107-2410-H-033-004-MY2）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研究過程中，感謝賴慈芸教授協助取得小野圭次郎《新制英語の作文研究法改訂增補版》一書，以及研究助理王芝云女士、楊儒信先生、李明蓉女士協助蒐集雜誌資料，修改過程中，承蒙《編譯論叢》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Exploring the Role of Magazine Translators During the Early Martial Law Era

Daphne Qi-rong Chang

The early martial law era in Taiwan (1949-1955) marked a pivotal shift from a pro-Japanese stance to a pro-US one, reflecting a transition of identity from Japanese subjects to Chinese migrants. This period,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is generally perceived as a time whe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employed literature and art as tools for nationalistic propaganda. Official literary policies predominantly shaped the literary world, giving rise to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This era's magazines, launched by numerous literary groups and state-operated entities under government patronage, have been the focus of extensive research, particularly their role in featuring combat and nostalgic literature, while the translations positioned alongside these texts have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translators' identities, their selec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motivations. Focusing on 36 magazines from the era, this investigation identifies the ten most prolific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ir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s. By exploring their translations and strategies,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ing on the translators, this research reevalu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 literary policies and individual agency, highlighting the critical role and impact of translators in this transformative period.

Keywords: martial law era, magazine study, translator study,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aiwan

Received: September 23, 2023

Revised: December 22, 2023; January 12, 2024

Accepted: December 11, 2024

壹、引言

沒有譯者，就沒有譯事。古希臘文學外譯、阿拉伯翻譯運動、托雷多翻譯運動、佛經翻譯、清末民初西方文學譯介，皆為史上著名翻譯大潮，不難想見譯者：安德羅尼庫斯（Livius Andronicus）將《奧德賽》（*Odyssey*）譯為拉丁文，開啟古希臘文學外譯史。胡奈恩（Hunayn ibn Ishaq）、穆薩三兄弟（Banu Musa brothers）、金迪（al-Kindi）、柯窪列茲米（al-Khorwarizmi）受阿拉伯帝國智慧宮（Bayt al-Hikma）招攬，共同逐譯古希臘典籍，推動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伊本·魯須德（Ibn Rushd）和阿德拉（Adelard of Bath）是托雷多翻譯運動兩大健將，前者以譯註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作品著稱，後者以首譯《幾何原本》（*Elements*）聞名。安世高是史載佛經漢譯第一人，今存譯經約 20 部，下啟千年譯經事業，期間參與者眾，鳩摩羅什、玄奘等是。嚴復、林紓並列清末譯界泰斗，嚴譯《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振聳發聵，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élias*）不脛走萬本，康有為（1913）說「譯才並世數嚴林」（頁 1），確實不假。

除了上述中西翻譯大潮，諸多歷史轉捩點亦可見譯者投身其間。依據 Druett（2011）研究，庫克（James Cook）之所以能越洋首航繞行紐西蘭、繪製首張精準的紐西蘭地圖，通曉波里尼西亞（Polynesia）各族語言的大溪地（Tahiti）青年圖帕伊亞（Tupaia）功不可沒。而本研究聚焦的戒嚴初期（1949—1955 年），既是臺灣從親日轉向親美的轉捩點，也是身分認同從大和遺民轉向中國移民的過渡期。蕭義玲（2011）指出：

五〇年代之所以特殊，在於不管是 1949 年隨國府遷臺的大陸新移民，或歷經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民眾，都同時經驗到一種與過去的歷史、社會的斷裂。（頁 151）

這種時空斷裂的經驗，致使 1950 年代易於為後世學者截然斷代，「加深論者將此時的文化、文學活動與時代處境緊密結合這種解釋架構的正當性」（蕭

義玲，2011，頁 151）。在美蘇冷戰和國共鬥爭的歷史框架下，過往論者大抵論定：在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視文藝為建立民族國家的宣傳手段，官方文藝政策主導文壇、反共文學應運而生，政府支持的文學團體紛紛成立，同時國營事業單位相繼創辦雜誌作為發表管道，刊行其間的創作廣受學界關注，從而勾勒出戰鬥文藝與懷鄉文學兩條軌跡。然而，與這些創作並行的翻譯作品卻罕見研究，對於譯者身分知之甚少，既不知由誰翻譯？有何翻譯？亦不知如何翻譯？為何翻譯？

自從上世紀末翻譯史研究出現譯者轉向，譯者顯身（visibility）、譯者主體性（subjectivity）、譯者自主（agency）逐漸成為論述主流。然而，相較於作者研究，更多譯者或是隱身在歷史軌跡中（Venuti, 2008）、或是在文化衝突中蒙上不白之冤，有待翻譯研究者爬櫛鑽研、翻案改寫（關詩珮，2014）。這群隱身於戒嚴初期的譯者，在當時勃興的雜誌上翻譯了哪些作品？推動了何種知識流行？促進了什麼文化交流？張誦聖（2022）認為，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力量看似滲透了整個文化生產場域，但：

由於臺灣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朝著一個更為完善的市場經濟發展，因此即使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早期年代，文化生產場域仍得以維持一種「類自主性（quasi-autonomous）」的生存狀態。（頁 67）

翻譯做為隱晦的書寫，得以讓譯者利用有限的自主性開拓出相對自由的論述空間。觀察這些跨域流動的譯者和跨越時空的譯作，或許能夠編織出彌縫時空斷裂的經緯、另闢反共與懷鄉之外的敘事主軸。

貳、戒嚴初期的雜誌翻譯活動

在臺灣出版史上，戒嚴初期或許是雜誌刊行比圖書發行更加暢旺的時期。根據《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國立中央圖書館，1956），1949 年臺灣本地出版的圖書總計 43 種。相較之下，1949 年臺灣約有 150 家雜誌（卜幼夫，

1998，頁 32），刊載內容五花八門。¹ 陳芳明（2011）也觀察到：

在一九五〇年上半葉的第一階段，提供文學作品發表的報章雜誌頗為眾多。幾乎可以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文學雜誌出版的數量以這段時期為最蓬勃興盛。（頁 281）

而 1950 年代文藝雜誌之所以特別發達，應鳳凰（2003）曾以官方文藝政策作為觀點提出解釋：

雜誌在這十年間由於政府支持的文學團體紛紛成立而相繼創辦，新雜誌因此接二連三出現的盛況，明顯呈現國民政府有意掌控文化生產，插足文學場域的強烈企圖。（頁 29）

戒嚴初期的雜誌不僅是文學發表的園地，也是譯作面世的管道，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官方文藝政策，或許另有歷史脈絡可循。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臺灣和中國透過日本轉譯了「雜誌」（magazine）的名與實，其中作品先於雜誌發表、再結集出版的作法，也輾轉流行到 20 世紀中葉的臺灣文化場域，既然作品發跡於雜誌，雜誌興盛也就在情理之中。至於戒嚴初期雜誌翻譯在臺灣的實踐是延續日本或是中國，則須考察當時的文化場域。張誦聖（2022）認為：

1949 年之後的臺灣文化場域是由一些特殊的歷史狀況所造就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國民黨政府強制施行的語言政策，這一政策讓那些不會說「國語」的臺灣人在文學場域獲得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受政府信任的外省作家因此占據了主導地位。（頁 67）

文學場域如此，翻譯場域亦如是。賴慈芸（2014）統計戰後 20 年（1945—1965 年）在臺灣有譯作單行本印行紀錄的 221 位譯者，發現外省譯者占 97%

¹ 林淑芬（2007）引用各家數據，指出臺灣 1950 年出版雜誌 144 種、1952 年全臺已登記的雜誌社共 223 家，但同時也指出《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制辦法》於 1950 年 3 月公布，「臺灣省雜誌協會」於同年 5 月成立，臺灣出版事業進入官方全面管制。在此期間，雜誌更迭頻繁，為求從雜誌觀察譯者活動軌跡，進而找出具影響力的譯者，本研究以刊行半年以上，或者既有書目資料亦可取得實體雜誌者，作為初步考察對象，再從中挑選出 36 種可見譯作刊行的雜誌作為考察範圍。

（其中 62% 滯留中國、35% 流亡來臺）、本省譯者占 3%。張綺容（2018）則聚焦於戒嚴初期身處臺灣並於雜誌發表譯作的 108 位譯者，其中 104 位為外省籍（96%）、四位為本省籍（4%）。這些外省譯者主導臺灣譯壇的同時，或許也讓中國清末民初的翻譯成規落地生根，包括以報章雜誌做為發表翻譯的主要出版管道（樽本照雄，2002），以及民初上海暢銷雜誌從外國報刊取材編譯的作法（葉嘉，2015）。

上述賴慈芸（2014）與張綺容（2018）的論文，都強調了譯者研究的重要性。作為戒嚴初期在臺譯者的初步研究，賴、張二人皆彙整了可靠的譯者列表，前者羅列 1945—1965 年間 84 位書籍譯者的年籍資料，後者列舉 1949—1955 年間 108 位雜誌譯者的年籍資料，並從獨尊中文的語言政策、反共親美的對外政策，解釋戒嚴初期的譯者結構與譯作選擇，藉以勾勒出冷戰初期在臺譯者生態，見林而不見樹，難免忽略個別譯者在「類自主性的生存狀態」如何顯身並主動抉擇，此外，由於統計資料略嫌不夠全面（如張綺容的研究僅選取五種雜誌記錄譯者活動），因此不易歸納出戒嚴初期雜誌譯者的角色和影響。

鑑於 1949 年之後雜誌在臺灣遍地開花，而雜誌又是當時譯者嶄露頭角的主要管道，是以，本研究參考 Pym（2014）提出的翻譯史研究方法，以臺灣戒嚴初期發行的 36 種雜誌作為考察範圍，先編纂出總書目（*catalogue*），²再從中選取翻譯篇數前十名的譯者作為研究對象編纂研究書目（*corpora*），據以描述其翻譯作品和翻譯實踐，從而提出一個新的理解架構——以譯者為主體，重新反思官方文藝政策與主體實踐的關係，並試圖回答譯者在戒嚴初期的重要性何在？對後世的影響為何？

² 本研究選取的 36 種雜誌，戒嚴初期共刊登 5,499 篇譯作，各雜誌的翻譯篇幅與翻譯篇數，詳見附錄 A「36 種雜誌的翻譯篇幅統計」和附錄 B「36 種雜誌的翻譯篇數統計」。

參、譯者的主體實踐

臺灣戒嚴初期有譯作在雜誌刊行的譯者中，篇數前十名者所發表的譯作：多則 60 篇、少則 37 篇，總計翻譯文章 502 篇，文類依次為文學 280 篇、雜文 83 篇、教育 54 篇、傳記 39 篇、科學 15 篇、醫學六篇，地理、家庭各五篇，機械四篇，音樂、生物、影視各三篇，軍事二篇，內容豐富而多元。依國別而論，排除原文資訊不詳的 103 篇，其餘 399 篇依序分別為美國 217 篇、英國 95 篇、日本 56 篇、德國 13 篇、法國七篇、奧地利四篇，匈牙利、義大利各二篇，印度、希臘、加拿大各一篇。以下按照翻譯篇數多寡依序介紹十位譯者。

一、張心漪

筆名辛夷、心漪，上海人，父親張其鎧是清末進士、吳佩孚文膽，母親聶其德是曾國藩的外孫女。張心漪從小在聶家花園成長，先後就讀中西女子學校、貝滿女子中學、燕京大學，後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1939 年於上海德國教堂與費驊成婚，1949 年來臺，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夫婿則任職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副局長。1950 年 2 月 16 日，鐵路管理局創辦了《暢流》半月刊，張心漪身為副局長夫人，開始為《暢流》提供譯稿（張心漪，2007）。

戒嚴初期張心漪共發表 60 篇雜誌譯作，包括 56 篇美國作家著作、四篇英國作家著作，文類為傳記 31 篇、文學 29 篇，大多刊於《暢流》（50 篇），1955 年才開始替《自由談》供稿，共發表十篇譯作。《自由談》和《暢流》雖然都是推廣旅遊的雜誌，但《暢流》以火車乘客為目標讀者、《自由談》則是文壇人士，因此，張心漪在《暢流》發表的譯作多為傳記和家庭小說，例如卡內基（Dale Carnegie）《林肯外傳》（*Lincoln, the Unknown*）（Carnegie, 1932）、福布斯（Kathryn Forbes）《慈母心》（*Mama's Bank Account*）（Forbes, 1968）、戴伊（Clarence Day）《天倫樂》（*Life with Father*）（Day,

1935)，在《自由談》發表的譯作則為嚴肅文學，包括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蘋果樹》（*The Apple Tree*）（Galsworthy, 1918）、凱瑟（Willa Cather）《殘百合》（*A Lost Lady*）（Cather, 1923）。

張譯不拘泥原文，例如“a nickel or a dime”（Forbes, 1968, p. 4）譯為「一毛或是兩毛錢」（福布斯，1943 / 1951，頁 60）；“Frequently the conversation degenerated into gossip”（Carnegie, 1932, p. 13）譯為「『東家長，西家短』是必然的題目」（卡內基，1932 / 1953，頁 27），都以歸化譯法便於讀者理解。又如下方〈殘百合〉對馥思德（Forrester）夫婦的簡述。

原文：

Mrs. Forrester was twenty-five years younger than her husband, and she was his second wife. He married her in California and brought her to Sweet Water a bride. They called the place home even then, when they lived there but a few months out of each year. But later, after Captain's terrible fall with his horse in the mountains, which broke him so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build railroads, he and his wife retired to the house on the hill. He grew old there,—and even she, alas! grew older. (Cather, 1923, p. 4)

張心漪譯文：

馥思德太太比她的丈夫小 25 歲，是續絃。他和她在加里福尼亞州結婚，新婚後帶她回甘溪鎮。雖則那時他們一年中只在這裡住幾個月，他們已認此地為家。後來，上尉在山間由馬上摔下來，大傷元氣，不能再築鐵路；他與他的妻子退休到山上的房子裡。他在那裡變老了，連她，哎，也老多了。（凱瑟，1923 / 1955，頁 64）

張譯簡潔優美，其中「續絃」譯自“she was his second wife”，「大傷元氣」則融合了“terrible”和“which broke him”，再再可見張譯跳脫原文結構，靈活再現原作文采。

二、錢歌川

本名錢慕祖，另有筆名味橄，湖南湘潭人，父親是縣知事，經常輪調各地，錢歌川跟著四處轉學，1922年考入東京師範學校文科三類，專攻英國文學，隔年入股開明書店，1926年底學成歸鄉執教鞭，課餘煮字，1927年首部譯作《娛妻記》（*To Please His Wife*）由開明書店出版，1930年遷居上海，進入中華書局擔任編輯，1936年赴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進修兩年，1938年返國途中寓居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編輯，1939年抵國，任教武漢大學外文系，1942年接受英國新聞處委任，主編譯報《世說週刊》，後改任翻譯中心，翻譯美國軍方所攔截的日軍電報，二戰結束後任職外交部、教育部，1946年應聘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同時兼任文學院院長，1950年7月移居臺南，任教於臺灣省立工學院和左營海軍軍官學校，並重拾譯筆（味橄，1948；錢歌川，1994）。

戒嚴初期錢歌川共發表 59 篇雜誌譯作，包括 37 篇美國作家著作、17 篇英國作家著作、三篇法國作家著作、一篇印度作家著作、一篇待考，文類全為文學，其中 35 篇刊於《晨光》、14 篇刊於《中國文藝》、四篇刊於《中華文藝》、二篇刊於《暢流》，《自由談》、《讀書》、《藝與文》、《當代青年》各刊一篇，譯筆暢達，好用歸化，原文若引用中國文人名言，錢譯便引經據典，例如 1954 年 6 月 1 日刊於《晨光》的〈馱獸〉（毛姆，1922 / 1954），譯自毛姆（William Maugham）著《中國小景》（*On a Chinese Screen*）（Maugham, 1922），內容描寫苦力的一生，文末徵引「中國的神秘家」（the Chinese mystic）作結。

原文：

In China it is man that is the beast of burden.

“To be harassed by the wear and tear of life, and to pass rapidly through it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arresting one’s course,—is not this pitiful indeed? To labour without ceasing, and then, without living to enjoy the fruit, worn

out, to depart, suddenly, one knows not whither, —is not that a just cause for grief?”

So wrote the Chinese mystic. (Maugham, 1922, p. 79)

錢歌川譯文：

在中國，馱獸原就是人呀。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簡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引自莊子齊物論——譯者注）

那位中國的神秘家如是說。（毛姆，1922 / 1954，頁 11）

錢譯以夾註指明「中國的神秘家」即莊子，並直接引用〈齊物論〉原文，呼應毛姆「在中國，馱獸原就是人呀」的觀察。

身為多產的譯者，錢歌川對於同代譯者的困境頗有體悟，認為：

繙譯實在比自己寫作要難，但反被一般人視為容易，甚至瞧不起繙譯的文字，因此有的雜誌根本不接受譯稿，有的把譯稿的稿費降低，都不免矯枉過正，而阻礙了譯介工作的進展。（錢歌川，1963，頁 3）

因此，錢歌川建議翻譯「最好是由國家來負起這個責任，集合國內的通儒學者，也和唐人翻譯佛經一樣認真地來幹」（錢歌川，1978，頁 69）。錢歌川學貫中西、身體力行，不僅於戒嚴初期翻譯培根（Francis Bacon）《散文集》（*Essays*），並譯輯美國報章雜誌趣聞出版《西笑錄》，一新文壇氣象。

三、馮宗道

筆名微之，浙江紹興人，1943 年浙江大學化工系畢業，考入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中國石油公司前身），1946 年派赴中油高雄煉油廠，1950 年出任臺灣戰後首份純翻譯雜誌《拾穗》主編，在任 15 年，主張文學可直譯、餘者皆意譯，譯文務求通俗、符合中學生程度（馮宗道，2000）。

身兼主編的馮宗道，戒嚴初期共發表 58 篇雜誌譯作，36 篇原文待考，其餘 22 篇為美國作家著作，文類包括雜文 20 篇、文學 19 篇、科學七篇，地

理、機械各三篇，軍事、醫學各二篇，生物、音樂各一篇，皆載於《拾穗》，首篇刊於1950年5月1日創刊號，譯自賈德諾（Erle Stanley Gardner）偵探小說《歸輪風雨》（*The Case of the Substitute Face*）（Gardner, 1938），分12期連載，譯文中規中矩，適時增譯、減譯、逆譯，讀來文從字順，例如女主角珮蕾紐培來（Belle Newberry）出場的段落。

原文：

Sun sparkled from the crested tops of restless waves as Perry Mason paced the deck, enjoying the fresh air and the morning sun. His hands were thrust deep in the pockets of a double-breasted coat, his rubber-soled shoes trod lightly along the teakwood deck. The warm breeze ruffled his wavy hair. He had circled the deck for the third time when the heavy door from the forward social hall was pushed open an inch or two. Della Street shouldered it open, to stand with wind-whipped skirts while Belle Newberry stepped across the high threshold. (Gardner, 1938, p. 8)

馮宗道（微之）譯文：

太陽在永不靜止的波峯上閃閃發光。丕利·麥森在甲板上散步，呼吸着新鮮空氣和欣賞那清晨的日出。他雙手深插在雙排鈕〔sic〕上衣的衣袋中，橡皮底的鞋子輕鬆地在甲板上踱步，和暖的微風拂過他的波形頭髮。當前端大廳的笨重大門被人推開一二吋時，他已在甲板上繞行三周了。苔拉·史菊里用肩推開了門，裙裾飄飄地站著，珮蕾紐培來也跟着跨出門檻。（賈德諾，1938／1950，頁57）

馮譯一來增譯動詞「呼吸著」，二來刪去甲板的材質為「柚木」（teakwood）、大廳為「交誼廳」（social hall）等細節，並順從中文「當……時」在前的語法，先譯「當前端大廳的笨重大門被人推開一二吋時」，再譯剩餘訊息。

相較於文學，馮譯其餘文類顯得更加靈巧，例如1950年6月1日《拾穗》第二期的軍事文章〈安全的雷達堡壘〉（汀斯利，1950／1950），譯自同年4月《大眾機械》（*Mechanic Illustrated*）的文章“Rubber Fortresses for A-Bomb

Defense” (Tinsley, 1950)，內容介紹「康奈爾防空研究所」(Cornell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Inc.) 研發的軍事設備「雷達天線罩」(Radome)，馮宗道音譯為「雷洞」，並將其功用譯介給臺灣讀者。

原文：

These radar outposts could be the modern equivalent of the frontier forts of Indian days. Miles apart in practically impassable wilderness, each must be a well-hidden, self-contained fortress, capable of guarding its precious equipment securely against any sneak attack. And sudden assault is just as sure as death and taxes. For if war comes again, the blinding of an enemy's eyes will be the first step before wholesale atomic destruction! (Tinsley, 1950, p. 82)

馮宗道(微之)譯文：

這種雷達前哨可以說是一種最新式的前線堡壘了，在實際上堡壘周圍幾哩之內原是一區杳無人烟的荒野，現在因了這完善的隱蔽，那麼這裝備優良的堡壘足可防衛任何的偷襲了。在未來的戰爭中，突然地下令攻擊毀壞敵手的「眼睛」——雷達，將是原子彈轟炸的第一步驟。

(汀斯利，1950 / 1950，頁1)

馮譯儘管可見誤譯(如「在實際上堡壘周圍幾哩之內原是一區杳無人烟的荒野」，原文意指「雷洞與雷洞之間相隔數哩，周圍皆是無法通行的荒野」)，但全段舉要治繁，聚焦在「雷洞」保衛雷達的用途，刪去原文第三句「突襲如同死亡與繳稅，躲也躲不掉」等細節，並將原文一、二句合併，符合其文學直譯、餘者意譯的主張。

四、黃謙恩

黃謙恩生平待考，戒嚴初期共發表 54 篇雜誌譯作，全數載於《讀書》半月刊，從第一卷第五期開始連載，篇名皆以〈怎樣練習英作文〉(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a，1949 / 1954b) 作為主標，內容翻譯自小野圭次郎 1949 年初

版的《新制英語の作文研究法》（小野圭次郎，1949），雖說是「作文」，實則為單句翻譯練習，小野圭次郎的原著讓日文讀者練習將日文句子翻譯成英文，黃謙恩的譯作則是讓臺灣讀者練習將中文句子翻譯成英文。原著共三編，第一編談學習方法，第二編為作文要素，第三編為範文，黃譯包含前兩編，其中第二編分為 21 單元，每單元先說明、後舉例，例如《讀書》第四卷第八期〈英文語句的省略法〉（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a），黃謙恩先翻譯省略的五大原則，再逐一舉例說明。以下為五大省略原則的原文和譯文。

原文：

1. 文意に影響を及ぼさない語句
2. 敬語その他飾りの語句
3. 口調などのためにそえてある語句
4. 英語の性質上略すべき語句
5. 構文上のつごうによって略すべき語句（小野圭次郎，1949，頁 222）

黃謙恩譯文：

1. 不會影響到文意的語句。
2. 中文裡特有修飾的語句。
3. 口頭語的語句。
4. 英文性質上省略的語句。
5. 構文上應該省略的語句。（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a，頁 11）

黃譯傾向直接借用日文漢字，其中有些中、日文互通（例如「文意」、「影響」、「性質」），有些則為中文所無（例如日文「構文」意指「句子結構」，中文實無「構文」一詞），還有些則是假同源詞（false friend），例如日文的「語句」意指單詞和短語，中文的「語句」則泛指句子。又如《讀書》第四卷第四期〈英文標點符號及其他〉，在說明句號的用法時，黃譯為「凡在文章的終結，一定要有句號『.』」（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b，頁 11），這裡的「文章」也是假同源詞，日文「文章」意指句子，中文「文章」則泛指獨立成篇的文字。

除了搬字過紙，黃謙恩亦根據中文、日文在語言、文化的差異而調整譯文，例如日文有敬語而中文無，因此，原文五大原則第二條「敬語その他飾りの語句」（敬語等修飾詞語），便歸化為「中文裡特有修飾的詞語」；再則，日文的語氣詞多於中文，因此，黃譯將第三條原則「口調などのためにそえてある語句」（因語氣等原因添加的詞語）改譯為「口頭語的語句」。在別篇譯文裡，黃譯也常將日本地名歸化為臺灣地名，例如將「富士山」、「長崎」、「東京」（小野圭次郎，1949，頁194），譯為「阿里山」、「臺北」、「高雄」（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a，頁11），「長崎港」（小野圭次郎，1949，頁233）則譯為「基隆港」（小野圭次郎，1949 / 1954b，頁12）。藉由歸化策略，黃譯讓讀者一邊學習英文、一邊學習中文、一邊認識臺灣。

五、邱慈堯

筆名天岳、岳兒，浙江吳興人，生於經商世家，家業為長江輪船公司，1947年畢業於上海私立大同大學化工系，經父親摯友引薦、中油協理金開英面試，於同年8月27日從上海啟程來到高雄煉油廠，1950年加入《拾穗》出版委員會擔任業務經理，一來負責添購英美雜誌供同仁翻譯，二來負責推廣《拾穗》，包括鼓勵私人經銷、設立讀者購書服務部、舉辦全省橋牌聯賽，成功為《拾穗》打開通路（邱慈堯，2006，頁82—89）。

身兼《拾穗》業務經理的邱慈堯，戒嚴初期共發表53篇譯作，包括31篇美國作家著作、四篇英國作家著作，其餘18篇原文待考，文類包括文學39篇、雜文十篇、影視三篇、音樂一篇，其中52篇刊於《拾穗》、一篇載於《西窗小品》，多為通俗之作，譯文歸化，首篇〈黑珠子〉（史諾，1949 / 1950）發表於1950年6月1日《拾穗》第二期，譯自史諾（Enid Sims Snow）1949年10月1日於《柯里爾週刊》（*Collier's*）發表的短篇小說“The Black Pearl”（Snow, 1949），故事講述托龍吐城（Toronto）的夫妻來到巴黎（Paris）詐財，丈夫蓋拉德（Gerald）帶妻子瑪泰（Marta）到波羅薩德珠寶舖（Brossard Frères），用25,250加元的支票買了顆黑珍珠，接著略施詭計，

讓店主以 40,000 加元買回，從中賺取價差。為此，夫妻倆在買完黑珍珠之後，又在巴黎多待了一週。

原文：

A week passed in the lives of Gerald and Marta, a week of small restaurants, of walks in the park, an occasional hour on a secluded bench, some visits to the Louvre. On the seventh morning, Gerald donned a new suit of clothes he had had made in London, left the Ritz, alone, and sauntered toward Broussard Frères. (Snow, 1949, p. 32)

邱慈堯（天岳）譯文：

下一個星期裏，蓋拉德和瑪泰，除了上館子吃飯，或在公園裡散步之外無所事事。挨到第七個早晨，蓋拉德換上了一套新衣服，這是他早就在倫敦時做就的，他獨自離開里茲，去到波羅薩德珠寶舖，進入店內。（史諾，1949 / 1950，頁 42）

邱譯以簡馭繁，原文可見夫妻倆參觀羅浮宮、在僻靜的長椅坐上一個鐘頭，以及丈夫一派悠閒走去珠寶店……等細節，然因與故事主線無關，邱譯加以刪去也不影響情節進展，讀起來簡練明快。

為了將《拾穗》推廣給本省大眾，邱慈堯鼓勵讀者私人經銷，並為此翻譯俄普森（William Hazlett Upson）《天才推銷家》（*The Fabulous Saga of Alexander Botts and the Earthworm Tractor*）（Upson, 1927），原著首見於 1927 年 4 月 16 日的《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當時曳引機等機器正大大改變美國社會，作者透過主角與蚯蚓牌曳引機公司（Earthworm Tractor Company）往來的信件和電報，鋪敘主角接二連三將曳引機賣給老實人，老實人看似受騙上當，但終究在曳引機的幫助下解決了生活難題。邱慈堯的譯文首見於 1951 年 11 月 1 日《拾穗》第 19 期，共連載 13 期，譯文維持原著的書信體裁，小說一開場，主角便毛遂自薦寫信給蚯蚓牌曳引機公司。

原文：

GENTLEMEN: I have decided you are the best tractor company in the country, and consequently I am giving you first chance to hire me as your salesman to sell tractors in this region.

I'm a natural-born salesman, have a very quick mind, am twenty-eight years old, am honest and reliable and can give references if required. I have already ha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s a machinery salesman, and I became familiar with your Earthworm tractors as a member of the motorized field artillery in France. I can demonstrate tractors as well as sell them.

When do I start work?

Very truly yours,

ALEXANDER BOTTS (Upson, 1927, p. 10)

邱慈堯（岳兒）譯文：

先生：我深知貴公司是國內最優良的一家曳引機公司，所以當然我要把最先的機會給予你們，以便雇用我為貴公司的推銷員，在這地區內銷售曳引機車。

我是一個天生的推銷家，有一副靈活的腦筋，年齡 28 歲，誠實可靠，如果需要的話，並可交納證件。我對於推銷機器已有相當經驗，而且蚯蚓牌的曳引機，我早就很熟悉，因為我一度是駐於法國的摩托化砲兵團的一員。我能詳加說明曳引機的性能像推銷它一般的簡易。

什麼時候我可以開始工作呢？

你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上（俄普森，1927 / 1951，頁 118）

邱譯的求職信中西合璧，兼具中文和英文的書信格式，例如「你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上」，就包含了英文書信的結語「你忠實的」（Very truly yours）和中文書信的末啟詞「上」，此外，臺灣 1950 年代找工作時還不太流行寫「推薦信」（references），因此譯文以「交納證件」來置換。邱譯《天才推銷家》（俄普森，1927 / 1951）備受讀者歡迎，既推廣了美國的商業精神，也為《拾穗》培養了一批推銷員。

六、郁仁長

筆名萇菘，上海人，父親郁穎英是絲行管事，郁仁長 1937 年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法律系，精通英、法雙語，1949 年隨中油播遷來臺，先在基隆負責材料管理，1950 年初調任臺北總公司，擔任總經理金開英的親信兼文膽，並開始為《拾穗》翻譯（馮宗道，1992）。

戒嚴初期郁仁長共發表 52 篇雜誌譯作，包含英國作家著作 41 篇、美國作家著作十篇，一篇出處待考，文類包括文學 40 篇、雜文 12 篇，盡數刊載於《拾穗》，其中 24 篇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譯詩。郁仁長譯筆歸化，例如刊於第 32 期的〈西風頌〉（雪萊，1820 / 1952），原詩“Ode to the West Wind”（Shelley, 1993）共五節，每節皆為十四行詩，以西風摧枯拉朽之勢，比喻浪漫主義時期破舊立新的革命力量，郁仁長嘗試用詞體翻譯，每一節前八行是玉樓春、後六行是浣溪沙，合起來一共 14 行，讀起來音韻悠揚、鏗鏘響亮，例如全詩第一節。

原文：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tic red,
Pestilence-stricken multitudes: O thou,
Who chariotest to their dark wintry bed

The winged seeds, 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 its grave, until
Thine azure 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 blow

Her clarion o'er the dreaming earth, and fill
(Driving sweet buds like flocks to feed in air)
With living hues and odours plain and hill: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 (Shelley, 1993, p. 35)

郁仁長譯文：

西風起兮秋光露
落葉盤旋空中舞
嬰兒姹女下梵宮
慘綠淒紅難卒覩

飄零憔悴身無主
載向隆冬淒冷路
殘枝暗裡茁新芽
凝佇春風情無邪

雲滿山丘綠滿疇
人間處處動閒愁
落紅遍地少人收

大地沉酣渾不覺
溫存肅殺兩無由
聽君吹徹一聲秋 (雪萊，1820 / 1952，頁 167)

郁譯〈西風頌〉(雪萊，1820 / 1952)大破大立，徹底揚棄原文的詩行、格律、韻式。原詩為十四行詩，韻式避開傳統十四行詩的韻腳，改採但丁 (Dante)《神曲》(*Divine Comedy*)「參韻體」(aba bcb cdc ded ee)，每

三行為一節，每一節的第二行與下一節的一、三行押韻，韻式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正好呼應全詩主題——西風吹落枯葉、吹散了種子，每逢春日，生生不息——生中有死，死中有生。郁譯的韻式與原詩大異其趣，儘管顧不到韻和義之間的呼應，但卻點染愁緒、平添悲秋之意，頗見豪傑譯的風範。

七、鄭嘉甚

鄭嘉甚生平待考，戒嚴初期共發表 47 篇雜誌譯作，25 篇出處不詳，15 篇美國作家著作、三篇英國作家著作、二篇義大利作家著作、二篇日本作家著作（與陳鏞合譯），文類包括雜文 29 篇、傳記五篇，文學、醫學、家庭各三篇，音樂、生物、機械、科學各一篇，其中 24 篇刊於《重流》、21 篇刊於《西窗小品》，《國風》和《軍中文摘》各刊一篇，譯述流麗，不惜大筆刪削，例如 1952 年 7 月 20 日刊於《西窗小品》的〈印度打虎記〉（米契爾，1924 / 1952），原文“Tiger-hunting in India”（Mitchell, 1924）出自 1924 年 11 月《國家地理雜誌》（*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第 46 卷第五期，作者是美國空軍之父米契爾（William Mitchell），當時印度猛虎橫行、殺人逾百，然因信仰之故不得殺之，遂懸賞外人入境打虎，米契爾聞風響應，萬事俱備，就等老虎現蹤。

原文：

Soon a tremendous shout came from the beaters, accompanied by wild screams and a great deal of pounding on trees. I looked to the right and saw one of the chief hunters cross the river rapidly toward the beat, in the very direction where the tigers were supposed to be. He began pounding on a large bamboo to keep the tigers from breaking out in that direction.

Our attention was distracted to our right front, when all of a sudden Budung grabbed my arm and pointed to our left front. There was the grandest sight of animal beauty and pent-up physical force that I had ever hoped to see. A great tiger had broken from the jungle at top speed on the opposite side and

was coming, faster than any horse can gallop, straight for me. Its size seemed prodigious and its coat, of the brightest-orange color streaked with jet-black, gleamed in the afternoon sun. On it came through a pool of water about two feet deep, which evaporated in spray around its flanks. The thick foliage interfered with my vision and I had to stand up in the swaying tree to get my shot. Enraged growls came with every stride. (Mitchell, 1924, p. 586)

鄭嘉甚譯文：

在眾獵戶呼喊、擊打樹木竹筒的囂嚷下。一頭老虎在我們左側出現了。雄偉的身姿表現出動人的健力美，步履〔sic〕的迅速賽過馬的急馳。體格巨大，毛色橘黃，夾雜著黑色的斑紋，在午後的陽光中閃耀。（米契爾，1924 / 1952，頁 35）

鄭譯簡明扼要譯述米契爾為民除害，符合《西窗小品》的〈譯稿準則〉：「文字要簡潔、生動而富色彩」、「原文不是聖經，大可刪節。別貪多，要精彩」（佚名，1952，頁 45）。不僅見於《西窗小品》的譯文如此，《重流》刊載的鄭譯也以刪潤見長，例如第三卷第七期〈成功的秘訣〉（帛蘭，1936 / 1954），摘述自帛蘭（Dorothea Brande）《奮起》（*Wake Up and Live!*）（Brande, 1936），原著共 12 章，鄭譯舉要刪蕪、融會貫通，濃縮成十節與讀者分享，在雜誌有限的篇幅裡傳遞勵志文學的精華。

八、夏耀

筆名山隱，黑龍江省哈爾濱人，父親是中東鐵路管理局董事會高階職員，家境優渥，生於安樂、長於戰亂。1932 年，哈爾濱遭日軍攻陷，夏耀舉家隨國民黨政府西遷，最後定居陪都重慶，就讀遷校至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1947 年化工系畢業，經二哥同學引薦進入高雄煉油廠，在前輩的帶領下分成三班煉油，煉的是上海煉油廠的存油，存油煉完後無油可煉，加入《拾穗》出版委員開筆鍊字（夏耀，2013）。

戒嚴初期夏耀共發表 42 篇雜誌譯作，12 篇出處不詳，其餘 30 篇皆為美國作家著作，文類包括文學 27 篇、雜文九篇，地理、家庭各二篇，科學、醫學各一篇，其中 37 篇刊於《拾穗》、五篇載於《重流》，譯文洗練，刪繁就簡，代表作〈海狼〉與桐聲合譯（倫敦，1904 / 1954）譯自倫敦（Jack London）《海狼》（*The Sea Wolf*）（London, 2015），首刊於《拾穗》第 49 期，共連載 14 期，節奏緊湊，例如第 12 章敘述船員鬥毆。

原文：

The last twenty-four hours have witnessed a carnival of brutality. From cabin to forecastle it seems to have broken out like a contagion. I scarcely know where to begin. Wolf Larsen was really the cause of it.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men, strained and made tense by feuds, quarrels, and grudges, were in a state of unstable equilibrium. Wolf Larsen disturbed the equilibrium, and evil passions glared up like flame in prairie-grass. (London, 2015, p. 318)

夏耀（山隱）與桐聲譯文：

此後的 24 小時內，我目睹瘋狂兇殘的景象，從船長室直到前船樓，毆鬥的事好似瘟疫蔓延，我不知道事情如何開始，但海狼拉森卻為真正的導火線。船員間的關係，因新仇舊恨，變得緊張異常，一觸即發，有如燎原大火，不可收拾。（倫敦，1904 / 1954，頁 129）

夏譯巧用合句法，將原文開頭四句併為譯文第一句，並加入轉折詞「但……卻」，讀來一氣呵成。譯文第二句則連用四字格，包括「新仇舊恨」、「緊張異常」，層層疊加，節奏鏗鏘。

此外，夏譯〈不堪回首話當年〉（蕭，1941 / 1952）率先將美式足球介紹給臺灣讀者，載於 1952 年 10 月《拾穗》第 31 期，原文“The Eighty-Yard Run”（Shaw, 1941）是爾溫·蕭（Irwin Shaw）的成名作，主角在一場美式足球練習賽中衝刺 80 碼達陣，教練激賞、隊友讚嘆、女友擁吻，所有幸福美好都定格在這一刻，小說開頭就是這場精彩的練習賽，夏耀譯筆老練、文從字

順，展現主角在球場上的風雲時刻，一路勢如破竹、過關斬將。

原文：

There was only the safety man now, coming warily at him, his arms crooked, hands spread. Darling tucked the ball in, spurted at him, driving hard, hurling himself along, all two hundred pounds bunched into controlled attack. He was sure he was going to get past the safety man. Without thought, his arms and legs working beautifully together, he headed right for the safety man, stiff-armed him, feeling blood spurt instantaneously from the man's nose onto his hand, seeing his face go awry, head turned, mouth pulled to one side. He pivoted away, keeping the arm locked, dropping the safety man as he ran easily toward the goal line, with the drumming of cleats diminishing behind him. (Shaw, 1941, p. 23)

夏耀（山隱）譯文：

現在對方僅餘下後衛一人，彎背張手，謹慎地向他奔來；達林將球藏在臂彎裡，抬高雙腿，載著二百磅重的軀體，猛向敵人衝去，他確信自己能突破對方的阻擋，他加思索，手腿動作優美一致，伸出拳頭直衝過去，立時感到對方鼻中的鮮血，噴濺在他握緊的拳頭上，他望見敵人面孔歪扭，頭部低垂，咧起嘴巴。他足跟一轉，繼續夾緊雙臂，拋下對方的後衛，從容地衝進球門線，身後紛雜的球鞋聲消失了。

（蕭，1941 / 1952，頁 131）

臺灣在 1952 年還不流行美式足球，電視轉播更是天方夜譚，但夏耀戮力以赴，透過精采的譯文，將凌厲的攻勢帶到讀者眼前。儘管以後見之明來看，少數美式足球術語翻譯得不夠妥貼，例如原文“stiff-arm”意指「伸長手臂阻擋防守球員將自己撂倒」，夏耀「伸出拳頭直衝過去」有失精準，但瑕不掩瑜。

九、陳鏌

筆名沉櫻、陳瑛，山東濰縣人，出身書香門第，1921 年考入山東省立第

一女子中學，期間受周樹人（筆名魯迅）、周作人的翻譯影響，嗜讀日本、北歐小說，次則為俄、法、德、英、美小說，1925年考入上海大學中文系，1927年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以短篇小說在文壇嶄露鋒芒，同時加入復旦話劇社、結識首任丈夫馬彥祥，1929年成婚，離滬北上，1931年離婚，邂逅北京大學教授梁宗岱，1934年雙雙赴日，1935年回天津成婚，抗戰爆發後遷居重慶北碚，因丈夫移情別戀，1944年帶兒女移居南岸，1946年輾轉赴滬，先後任教於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復旦大學中文系，1948年來臺，於苗栗縣頭份鎮落腳，任教於私立大成中學。

戒嚴初期陳鏗共發表42篇雜誌譯作，八篇出處不詳，21篇英國作家著作、四篇法國作家著作，奧地利、匈牙利、日本（與鄭嘉甚合譯）各二篇，美國、加拿大、希臘各一篇，文類包括文學32篇、科學五篇、傳記三篇，雜文、生物各一篇，其中22篇刊於《中國文藝》、14篇刊於《重流》、三篇刊於《中華文藝》、二篇刊於《文藝月報》、一篇刊於《藝與文》，譯文清新曉暢，適時增譯裨益讀者理解，例如1953年6月1日刊於《中國文藝》第二卷第四期的〈珠鍊〉（毛姆，1936 / 1953），原著“A String of Beads”（Maugham, 1936）為對話體小說，作者毛姆以框架故事開場，陳譯保留原著架構，並增添襯字使譯文語氣和語意完足。

原文：

“What a bit of luck that I’m placed next to you,” said Laura, as we sat down to dinner.

“For me,” I replied politely.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I particularly wanted to have the chance of talking to you. I’ve got a story to tell you.” (Maugham, 1936, p. 187)

陳鏗譯文：

「真運氣，我的位子正在你的旁邊」，在一個宴會上，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勞拉這樣對我說。

「我也正有同感呢」。我禮貌地回答。

「是嗎？這可還要事實證明。我倒是想和你談談，因為，我有個故事要告訴你。」（毛姆，1936 / 1953，頁 17）

相較之下，陳鏞與鄭嘉甚合譯的〈木石〉（舟橋聖一，1938 / 1953）大量沿用「科學者」、「當面」、「遵奉」、「囑望」、「食餌」等日文漢字，加上句構異化，讀來略嫌詰屈聱牙，例如開場對男主角的介紹。

原文：

自分の誠實は、たゞ、當面の研究題目、サルヴアルサン劑と黴毒の關係を、遮二無二、究め盡さんとするところにあるばかりだと二桐は、いつも覺悟をきめてるた。（舟橋聖一，1938，頁 147）

陳鏞、鄭嘉甚譯文：

二桐在任何時候都斷然自己的誠實來向着當面的研究類〔sic〕目，洒爾伐爾散劑與黴毒的關係，傾其全力來鑽究明白。（舟橋聖一，1938 / 1953，頁 121）

儘管陳譯使用逆譯法，將主詞「二桐」和謂詞「いつも覺悟をきめてるた」（下定決心）提前，從而傳達出原文的大意，但細節處（如「斷然自己的誠實」）意味不明，遠不如翻譯毛姆等英國作家來得清順易曉。

陳鏞 1955 年移居臺北，任教於第一女子中學，1965 年從英譯選集《高貴的遊戲》（*The Royal Game*，今譯《蓋世棋蹟》）轉譯褚威格（Stefan Zweig）的中篇小說《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於《新生副刊》刊載，引起廣大迴響，1967 年出版單行本，公認為陳鏞的翻譯代表作。

十、孫賡年

筆名細雨、沙金，浙江奉化人，浙江大學機械系畢業，1938 年進入甘肅油礦局運輸處總處，後考上公費留美，於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取得工程碩士，期間進修德文，1947 年 1 月返國，6 月由中油調派來臺灣修復高雄煉油廠，爾後加入《拾穗》譯者行伍，譯介《盲

者之歌》（*Der Blinde Geronimo und Sein Bruder*）（Schnitzler, 1929）、《柏林省親記》（*Emil und die Detektive*）（Kästner, 1994）等德語文學，並開闢「西書評介專欄」介紹英美文壇，1955年考取西德的研究生獎學金，奉准赴德進修（孫賡年，1966）。

戒嚴初期孫賡年共發表 37 篇雜誌譯作，二篇出處待考，15 篇美國作家著作、13 篇德國作家著作、五篇英國、二篇奧地利，文類包括文學 35 篇，科學、雜文各一篇，其中 35 篇刊於《拾穗》、二篇《西窗小品》，首篇〈盲者之歌〉（席尼茲勒，1929 / 1950）發表於 1950 年 5 月 1 日《拾穗》創刊號，譯自席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意識流小說《盲者之歌》（Schnitzler, 1929），分兩期連載，「譯句力求忠實」（席尼茲勒，1929 / 1950，頁 69），原著從主角的行止帶出故事場景，孫譯信實，頗富異國情調。

原文：

Der blinde Geronimo stand von der Bank auf und nahm die Gitarre zur Hand, die auf dem Tisch neben dem Weinglase bereit gelegen war. Er hatte das ferne Rollen der ersten Wagen vernommen. Nun tastete er sich den wohlbekanntem Weg bis zur offenen Türe hin, und dann ging er die schmalen Holzstufen hinab, die frei in den gedeckten Hofraum hinunterliefen. (Schnitzler, 1929, p. 1)

孫賡年譯文：

盲者喬羅尼摩從椅上站起身來，將那已經放在棹上的，靠近酒杯邊的吉他，拿在手中。他已經聽到了遠遠的，第一輛駛來的車輪聲。現在，他沿着走得熟透了的老路，摸索着走向開着的門，然後走下狹窄的木梯，到了蔭蓋着的庭院。（席尼茲勒，1929 / 1950，頁 69）

此外，1950 年 7 月首刊於《拾穗》第三期的〈柏林省親記〉（凱斯特納，1929 / 1950），是德國兒童文學之父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的名著，當時兒童文學尚未普及，孫賡年（1966）將之歸類為「家庭倫理小說」（頁 48），認為「可以作為中學生的具有教育意義的課外讀物」（頁 48），並視

之為「動作多而說理少」（凱斯特納，1929 / 1950，頁 87）的中篇小說，原著開頭就是一連串動作，一邊敘事、一邊寫景，讀來格外生動。

原文：

»So«, sagte Frau Tischbein, »und nun bringe mir mal den Krug mit dem warmen Wasser nach!« Sie selber nahm einen anderen Krug und den kleinen blauen Topf mit der flüssigen Kamillenseife und spazierte aus der Küche in die Stube. Emil packte seinen Krug an und lief hinter der Mutter her.

In der Stube saß eine Frau und hielt den Kopf über das weiße Waschbecken gebückt. Ihre Frisur war aufgelöst und hing wie drei Pfund Wolle nach unten. Emils Mutter goß die Kamillenseife in das blonde Haar und begann, den fremden Kopf zu waschen, daß es schäumte. (Kästner, 1994, p. 24)

孫賡年譯文：

「那末」，孤寡的机足夫人和她的兒子艾密說，「現在你把水瓶和熱水一起拿來！」她自己也拿了另外一只水瓶，和一只盛放藥水肥皂的小而藍的皂缸，從廚房走到客室。艾密拿着他自己的水瓶，跟在後面。客室裏已經坐着一位女賓，彎着身子，把頭對着白色的洗臉缸。她的頭髮披散着，看上去好像有三磅毛線從她的頭上掛下來一樣。艾密的母親把藥水肥皂倒在金黃色的頭髮上，開始替客人洗頭。（凱斯特納，1929 / 1950，頁 87）

孫譯緊跟原文，對話段落維持德文語序——先聞其聲（「那末」）、再現其人（「孤寡的机足夫人」）。為了幫助讀者瞭解對話雙方的關係，孫譯增添「她的兒子艾密」，又考量到洗髮精在臺灣仍屬罕見，孫譯省去“flüssigen Kamillenseife”（洋甘菊洗髮精）和“schäumte”（搓出泡泡），前者以「藥水肥皂」簡單帶過，後者譯為「開始替客人洗頭」。〈柏林省親記〉在《拾穗》分為八期連載，期間同名電影上映，從而獲得廣大迴響。

肆、邊陲上的核心人物

本研究以臺灣戒嚴初期發行的 36 種雜誌作為考察範圍，各雜誌翻譯篇幅不一，多則 100%，少則 0.5%，若取平均數，則譯作篇幅大約占 20%（見附錄 A），顯見翻譯並非當時的主流文本，相較於創作，譯作堪稱位居邊陲。然而，根據 Even-Zohar（1990）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的假定，翻譯文本在臺灣戒嚴初期應處於核心地位，假若細究本文十位譯者的身分或影響，或許也會推導出類似的主張。

戒嚴初期由於政權與官方語言幡然轉換，在臺日文作品遭禁、本省日文作家噤聲，文壇面臨中文讀物匱乏的窘境，符合 Even-Zohar（1990）所述翻譯位居核心的情況：

一、多元系統尚未成形，文學「稚嫩」、正在確立；二、文學位處（一大群相關文學的）「邊陲」或「勢弱」；或既邊陲又勢弱；三、文學走到轉捩點、遭逢危機或處於空檔。³（頁 47）

值此之際，翻譯文學積極參與形塑多元系統中心，著名譯作大多出自文壇大家或前衛作家之手，創作與翻譯界線模糊，譯作講求「充分」（adequacy）勝過「易懂」（acceptability）。張錦忠（2000）以多元系統理論檢視《現代文學》（1960—1973 年）的翻譯計畫，認為《現代文學》創刊的 1960 年可見「文庫『匱乏』現象，大可假借翻譯文學來填補」（頁 218），並評斷：

《現代文學》乃用此空檔，完成臺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現代主義轉向」，而其中的主力，顯然是來自於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在此不僅是填補匱乏的外援，更是彰顯文學的新穎意識的文庫，有助於本國文學系統求新求變，建構新的文化資產。（頁 222）

至於 1956 年創刊的《文學雜誌》（1956—1960 年），張錦忠（2000）認為雖然是《現代文學》的先驅，譯介了不少歐美文學作品，但未獲得廣大迴響，

³ 由研究者自行翻譯。其中「多元系統」（polysystem）一詞亦可見「複系統」等譯法。

原因在於：

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臺灣文學複系統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反共／鄉愁文學，反映的是三民主義文藝政策。延續五四傳統的日據時代文學家或因白色恐怖而噤若寒蟬，或因語言轉換而暫時歇筆。（頁220）

推而廣之，翻譯文本在1950年代確實位居邊陲，並未積極參與建構中心，遑論重寫文學史。

張錦忠的推論與 Even-Zohar 的理論看似矛盾，但若以譯者為主體來描述這段歷史，或許得以解釋這群邊陲上的核心人物如何藉由翻譯在保守中革新、在新潮裡守舊。本文討論的十位譯者，除卻生平待考的黃謙恩和鄭嘉甚不論，其餘八位譯者皆為靠近核心的公教人員，其中馮宗道、邱慈堯、郁仁長、夏耀、孫賡年為公職人員，任職於中國石油公司，隸屬經濟部，郁仁長是總經理秘書，孫賡年曾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馮宗道、邱慈堯、夏耀加入員工勵進會（即中國國民黨在國營企業的生產事業黨部）；錢歌川、張心漪、陳鏞是教職人員，錢歌川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同時是開明書店股東；張心漪不僅是臺大外文系教授，也是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副局長夫人；陳鏞成名於1930年代中國文壇，與林海音是文友，先後任教於私立大成中學、臺灣省立臺北第一女子中學。此外，十位譯者的發表園地多為核心雜誌，其中《軍中文摘》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發行，《拾穗》和《暢流》則由國民黨生產事業黨部創辦，發行量都在一萬份以上，餘者亦獲官方支持，以身分觀之，有報人創辦的《讀書》、《中國文藝》、《西窗小品》，有公務員創辦的《重流》、《晨光》。總而言之，十位譯者皆非泛泛之輩，其發表的譯作在戒嚴初期具有一定影響力。

這群譯者的譯作看似位居邊陲，不似反共文學與鄉愁文學入流，但確實重塑了臺灣戒嚴初期的文化場域。在此之前，臺灣以日文為溝通載體，仰賴日本來轉譯西洋文藝與新知。到了戒嚴初期，譯者大多為外省籍，以中文為溝通載體，仰賴美國譯介西方世界，從而「間接參與推動了政府的語言政策，

亦協助執行親美反共的國策」(張綺容, 2018, 頁 24)。本文十位譯者的譯入語皆為中文, 原文來源以美國為主(占 54%)、英國次之(占 24%)、日本又次(占 14%), 縱使源自日本, 翻譯內容仍是英文教學, 從而形塑知識界從親日轉為親美的趨勢。在翻譯實踐上, 十位譯者分別承繼了民初譯壇的成規, 錢歌川、鄭嘉甚、邱慈堯延續民初譯報實踐, 從外國報刊取材編譯, 不求譯全而求易懂, 例如錢歌川以筆名味橄於《晨光》輯譯〈西笑錄〉33 篇, 每篇包含三到六則詼諧短文, 譯文道地而簡潔, 鄭嘉甚則善於剪裁原文, 邱慈堯的《天才推銷家》也只選擇符合國情的故事翻譯。⁴ 相較之下, 馮宗道、陳鏌、孫賡年的翻譯則充分表述原文內容, 馮宗道標榜文學直譯, 孫賡年則自陳「譯句力求忠實」(席尼茲勒, 1929 / 1950, 頁 69), 陳鏌的翻譯則受魯迅影響。在 1929 年底、1930 年初那場信順之爭中, 魯迅主張直譯、力持寧信而毋順, 梁實秋則主張意譯、強調譯書首重看得懂, 因此, 陳鏌的翻譯風格與馮宗道、孫賡年相近, 都以信實為主, 不同於張心漪、黃謙恩、郁仁長、夏耀以流暢見長, 後四位譯者大多譯自單行本, 例如張心漪譯《林肯外傳》、黃謙恩譯〈怎樣練習英作文〉系列、郁仁長譯《雪萊詩選》、夏耀譯《海狼》, 遣詞造句皆傾向歸化, 貼近梁實秋的意譯主張。

十位譯者不僅沿襲民初譯壇的翻譯實踐, 在文本選擇上也可見 1920、1930 年代遺緒, 其所譯介的卡內基、戴伊、高爾斯華綏、凱瑟、雪萊、倫敦、毛姆、席尼茲勒等, 都是 1949 年之前聞名中國的西方作家。卡內基的《處世之道》(*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初版兩年便可見謝頌羔、戴石合譯本於上海問世, 而且一時之間譯本輩出(蘇薇方, 2018, 頁 93—94); 戴伊的《天倫樂》於 1935 年初版, 1937 年呂叔湘就出了選譯本《跟父親一塊兒過日子》; 高爾斯華綏於 1920 年代名滿中國, 首譯應為 1921 年

⁴ 1953 年 2 月 1 日, 《拾穗》第 34 期〈讀者來鴻〉刊出鄭雇青先生詢問: 「包茲故事, 可否每期刊出一篇?」所謂「包茲故事」, 即邱慈堯翻譯的《天才推銷家》, 當時仍在《星期六晚郵報》連載, 編輯回覆道: 「包茲故事因一部分不和我國國人口味, 故譯者必須精心選擇, 不一定每期都有」(編輯部, 1953, 四)。

5月31日刊於《戲劇》創刊號陳大悲翻譯的《銀盒》（*The Silver Box*）（謝天振、查明建，2003，頁253—254）；凱瑟則於1929年8月10日由趙景深於《小說月刊》上譯介紹中國讀者（謝天振、查明建，2003，頁264）；雪萊的譯介應始於1911年蘇曼殊於日本出版的譯詩集《潮音》，收錄雪萊五幕詩劇《查理一世》（*Richard I*）尾聲的詩作〈冬日〉（“A Song”），從此開啟雪萊與中國的翻譯因緣（謝天振、查明建，2003，頁267—303）；倫敦則是中國1920至1940年代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截至1949年為止，共計出版五種短篇小說選，長篇小說《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則可見三種譯本，另有《白牙》（*White Fang*）中譯本二種（謝天振、查明建，2003，頁343）；毛姆於1919—1920年間造訪中國，至於譯介則以1930年代為多，1933年5月1日可見方于翻譯的劇作《毋寧死》（*The Sacred Flame*）於《文藝月刊》連載，1934年由正中書局出版單行本（賈植芳，2010，頁760）；席尼茲勒也是先以劇作揚名中國，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刊載北京大學宋春舫教授羅列的〈近世名戲百種目〉，上頭可見席尼茲勒的連環戲《阿那托爾》（*Anatol*），從而引來沈雁冰和郭紹虞搶譯（鍾欣志，2022）。

綜上所述，這群透過核心雜誌發聲的核心譯者，為戒嚴初期處於稚嫩、邊陲、勢弱、空檔的臺灣文學場域，橫向移植了歐美文化與中國譯壇的翻譯實踐，並縱向繼承了民初至1949年前中國譯壇的選譯傳統，從而助長臺灣從親日轉向親美、身分認同從大和遺民轉為中國移民。儘管官方文藝政策主導文壇，十位譯者仍在戰鬥文藝與懷鄉文學之外另闢蹊徑，從西方引進書信體小說、對話體小說、意識流小說等體裁，翻譯笑話、遊記、傳記、詩歌、小品文、偵探小說、兒童文學、勵志文學等文類，其翻譯筆法各有千秋，直譯、意譯各有所好——有增、有減、有順、有逆，其翻譯緣由也大相徑庭，張心漪或許是受到丈夫鼓勵，錢歌川或許是秉持知識份子的重責大任，馮宗道身為《拾穗》主編，自然多多「譯」善，以免稿荒，邱慈堯則是《拾穗》業務

經理，為鼓勵學生經銷而翻譯《天才推銷家》。單從選材自由、譯法自由來看，戒嚴初期「確實存在著一個半自主性的文化場域」（張誦聖，2022，頁67），譯者躲在作者身後操縱譯本，利用有限的自主性開拓出相對自由的論述空間，並透過自主的選擇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樞紐，藉由文本選譯、文庫（repertoire）更新，積極參與建構臺灣文壇的新中心，讓歐美新知與民初翻譯實踐融入臺灣戒嚴初期的文化場域，與創作文本一同打造自由中國的獨特文化，進而重寫文學史。

伍、結論

戒嚴初期的譯者推動西洋知識於臺灣流行，從美國、英國的書報雜誌翻譯了 280 篇文學作品及 222 篇各式主題的文章，並帶來民初中國譯壇的風尚與全島知識份子交流，既可見橫的移植，亦可見縱的繼承。在官方文藝政策主導下，雜誌譯作宛如一陣自由的風，捎來了西方自由民主陣營的信息，給予了譯者從選材到再現的自由空間，在當時封閉保守的文化氛圍裡，戒嚴初期的譯者選譯了有別於反共、懷鄉主題的域外新知潮流，其中也蘊含了 1949 年之前中國譯壇的遺緒，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此外，十位譯者透過翻譯自由詮釋、再現原文，也自由呈現其對身分（例如中國移民／大和遺民）、文學（例如美國文學／日本文學）、筆法（例如直譯／意譯）、立場（例如左派／右派）的認同或否定。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政策下，東洋文化成為伏流，翻譯自日本的英文學習教材成為臺美之間的橋樑，1949 年之前伸向東瀛的翻譯橋漸漸遭到棄置。

「翻譯」一詞本身是曖昧的表述，既可指「將某種語言文字用另外一種語言文字表達」的行為，亦可指翻譯行為的結果，或是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本文提出一個新的理解架構，不以譯本或理論為論述主軸，而以譯者為主體，從而理解譯者如何參與建構戒嚴初期的臺灣譯壇，希望透過詮釋角度的轉換，

重新將「翻譯」在 1950 年代的意義問題化，藉此扭轉僅將「翻譯」併入執行官方文藝政策的傳統解釋，這種解釋容易將「翻譯」視為官方政策的推手、文藝創作的補白，忽略了「翻譯」可以是文本旅行的載體、可以是時空越界的主體、也可以是跨國研究的客體，更忽略了「翻譯」在現代史上的意義，並且過分將譯壇與 1950 年代的特殊氛圍緊密相連。在官方語言截然改變、中文寫作人才不足、中文創作素材匱乏的空檔，戒嚴初期的譯者將英美文本擺渡到臺灣島嶼，途中或許曾於中國停留，這樣的時空越界讓 1950 年代不再截然斷代，而是透過譯者作為文化樞紐、承上啟下，編織出「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歐風美雨，和魂漢才」（陳允文，2016，頁 27）的大時代。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卜幼夫（1998）。〈百年來雜誌事業的發展〉。載於中華民國雜誌年鑑編輯委員會（主編），《中華民國雜誌年鑑 1950—1998》（頁 30—35）。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
- 【Pu, Y. F. (1998). Bainianlai zazhi shiye de fazhan.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Magazine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 yearbook: 1950-1998* (pp. 30-35). Magaz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小野圭次郎（1954a）。〈英文語句的省略法——怎樣練習英作文之四一〉（黃謙恩譯）。《讀書》，4（8），11—14。（原著出版年：1949）
- 【Ono, K. (1954a). Yingwen yuju de shengluefa: Zenyang lianxi Ying zuowen zhi siyi (Q. E. Huang, Trans.). *Dushu*, 4(8), 11-1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 小野圭次郎（1954b）。〈英文標點符號及其他——怎樣練習英作文之三七〉（黃謙恩譯）。《讀書》，4（4），11—14。（原著出版年：1949）
- 【Ono, K. (1954b). Yingwen biaodian fuhao ji qita: Zenyang lianxi Ying zuowen zhi sanqi (Q. E. Huang, Trans.). *Dushu*, 4(4), 11-1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 毛姆（Maugham, W. S.）（1953）。〈珠鍊〉（陳鎡譯）。《中國文藝》，2（4），17—18。（原著出版年：1936）
- 【Maugham, W. S. (1953). Zhulian (Y. Chen, Trans.). *Zhongguo Wenyi*, 2(4), 17-1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 毛姆（Maugham, W. S.）（1954）。〈馱獸〉（錢歌川譯）。《晨光》，2（4），11。（原著出版年：1922）

- 【Maugham, W. S. (1954). Tuo shou (G. C. Qian, Trans.). *Chengguang*, 2(4), 1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 卡內基 (Carnegie, D.) (1953)。〈林肯外傳〉(心漪譯)。《暢流》，7(6)，27—29。(原著出版年：1932)
- 【Carnegie, D. (1953). Lincoln waizhuan (Y. Xin, Trans.). *Changliu*, 7(6), 27-2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2)】
- 史諾 (Snow, E. S.) (1950)。〈黑珠子〉(天岳譯)。《拾穗》，2，41—44。(原著出版年：1949)
- 【Snow, E. S. (1950). Hei zhuzi (Y. Tian, Trans.). *Shisui*, 2, 41-4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 汀斯利 (Tinsley, F.) (1950)。〈安全的雷達堡壘〉(微之譯)。《拾穗》，2，1—3。(原著出版年：1950)
- 【Tinsley, F. (1950). Anquan de leida baolei (Z. Wei, Trans.). *Shisui*, 2, 1-3.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 米契爾 (Mitchell, W.) (1952)。〈印度打虎記〉(嘉甚譯)。《西窗小品》，16，33—37。(原著出版年：1924)
- 【Mitchell, W. (1952). Yindu da hu ji (S. Jia, Trans.). *Xichuang Xiaopin*, 16, 33-3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4)】
- 舟橋聖一 (1953)。〈木石〉(陳瑛、鄭嘉甚譯)。《重流》，2(12)，121—130。(原著出版年：1938)
- 【Funahashi, S. (1953). Mu shi (Y. Chen & J. S. Zheng, Trans.). *Chongliu*, 2(12), 121-130.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 佚名 (1952)。〈譯稿準則〉。《西窗小品》，18，45。
- 【Anonymous. (1952). Yigao zhunze. *Xichuang Xiaopin*, 18, 45.】
- 味橄 (1948)。《游絲集》。中華。
- 【Wei, G. (1948). *Yousi ji*. Chunghwa.】
- 帛蘭 (Brande, D.) (1954)。〈成功的秘訣〉(鄭嘉甚譯)。《重流》，3(7)，

73—82。(原著出版年：1936)

【Brande, D. (1954). Chenggong de mijue (J. S. Zheng, Trans.). *Chongliu*, 3(7), 73-8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林淑芬(2007)。<〈國家圖書館期刊資源的典藏利用暨「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9—17。

【Lin, S. F. (2007). Guojia tushuguan qikan ziyuan de diancang liyong ji “kai fengqi zhi xian: Zazhi chuangkan zhan”. *New Books: Recent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05, 9-17.】

邱慈堯(2006)。<〈才疏學淺誤一生〉。載於中油人回憶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油人回憶文集(第二集)》(頁82—89)。中華民國石油事業退休人員協會。

【Chiu, C. Y. (2006). Cai shu xue qian wu yisheng. In Zhongyouren Huiyi We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Zhongyouren huiyi wenji* (Vol. 2, pp. 82-89). Zhonghuaminguo Shiyou Shiye Tuixiu Renyuan Xiehui.】

俄普森(Upson, W. H.)(1951)。<〈推銷家亞歷山大包茲的故事之一〉(岳兒譯)。《拾穗》，19，118—128。(原著出版年：1927)

【Upson, W. H. (1951). Tuixiaojia Yalishanda Baozi de gushi zhi yi (E. Yue, Trans.). *Shisui*, 19, 118-12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倫敦(London, J.)(1954)。<〈海狼〉(山隱、桐聲譯)。《拾穗》，53，129—139。(原著出版年：1904)

【London, J. (1954). Hailang (Y. Shan & S. Tung, Trans.). *Shisui*, 53, 129-13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4)】

夏耀(2013)。<〈驀然回首〉。《石油通訊》，742，38—39。

【Xia, Y. (2013). Moran hui shou. *CPC Monthly*, 742, 38-39.】

孫賡年(1966)。<〈廿年一覺高雄夢〉。《石油通訊》，178，45—48。

【Sun, G. N. (1966). Niannian yijue Gaoxiong meng. *CPC Monthly*, 178, 45-48.】

席尼茲勒(Schnitzler, A.)(1950)。<〈盲者之歌〉(孫賡年譯)。《拾穗》，

1, 68—74。 (原著出版年：1929)

【Schnitzler, A. (1950). *Mangzhe zhi ge* (G. N. Sun, Trans.). *Shisui*, 1, 68-7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56)。《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56). *Zhonghuaminguo chuban tushu mulu*. Chinese Culture and Publishing Committee.】

康有為 (1913)。〈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庸言》，1 (7)，1。

【Kang, Y. W. (1913). *Qinnan xiansheng xie wanmu caotang tu tishi jian zeng fu xie*. *Yong Yang*, 1(7), 1.】

張心漪 (2007)。《心漪集》。典藏藝術家庭。

【Zhang, X. Y. (2007). *Recollection*. Diancan Art & Collection.】

張綺容 (2018)。〈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臺譯者研究〉。《翻譯學研究集刊》，22，1—43。

【Zhang, D. Q. (2018). *Translated island: A study on translators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martial law period*.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2, 1-43.】

張誦聖 (2022)。《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Zhang, S. S. (2022).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張錦忠 (2000)。〈翻譯、《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複系統〉。《中外文學》，29 (5)，216—225。 [https://doi.org/10.6637/CWLQ.2000.29\(5\).216-225](https://doi.org/10.6637/CWLQ.2000.29(5).216-225)

【Tee, K. T. (2000). *Tranlation, Xiandai Wenxue, and literary polysystem in Taiwan*. *Chung Wai Literary*, 29(5), 216-225. [https://doi.org/10.6637/CWLQ.2000.29\(5\).216-225](https://doi.org/10.6637/CWLQ.2000.29(5).216-225)】

陳允文 (2016)。〈浪蕩子與過來人——專訪楊澤〉。《聯合文學》，381，

26—31。

【Chen, Y. W. (2016). *Langdang zi yu guolai ren: Zhuanfang Yang Ze. UNITAS, 381, 26-31.*】

陳芳明（2011）。《台灣新文學史》。聯經。

【Chen, F. M. (2011).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Linking.*】

雪萊 (Shelley, P. B.) (1952)。〈雪萊詩選〉(萇菘譯)。《拾穗》，32，165—168。(原著出版年：1820)

【Shelley, P. B. (1952). *Shelley shixuan* (H. Chang, Trans.). *Shisui, 32, 165-16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20)】

凱斯特納 (Kästner, E.) (1950)。〈柏林省親記〉(孫賡年譯)。《拾穗》，3，87—97。(原著出版年：1929)

【Kästner, E. (1950). *Bolin xingqin ji* (G. N. Sun, Trans.). *Shisui, 3, 87-9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凱瑟 (Cather, W.) (1955)。〈殘百合〉(張心漪譯)。《自由談》，6(7)，61—64。(原著出版年：1923)

【Cather, W. (1955). *Can baihe* (X. Y. Zhang, Trans.). *Ziyou Tan, 6(7), 61-6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馮宗道 (1992)。〈斯人雖往文藻猶存——懷僑儻儒雅的知友郁仁長先生〉。《石油通訊》，492，70—75。

【Feng, Z. D. (1992). *Siren sui wang wenzao youcun: Huai titang ruya de zhiyou Yu Ren-Chang xiansheng. CPC Monthly, 492, 70-75.*】

馮宗道 (2000)。《楓竹山居憶往錄》。

【Feng, Z. D. (2000). *Feng zhu shan ju yiwang lu.*】

葉嘉 (2015)。〈「實用」的演變：民初上海雜誌譯報實踐初探〉。《編譯論叢》，8(1)，1—40。[https://doi.org/10.29912/CTR.201503_8\(1\).0001](https://doi.org/10.29912/CTR.201503_8(1).0001)

【Ye, J. (2015). *Practicality and change: The role of translations from Western periodicals in China's early republican magazine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8(1), 1-40. [https://doi.org/10.29912/CTR.201503_8\(1\).0001](https://doi.org/10.29912/CTR.201503_8(1).0001)】

賈植芳（主編）（2010）。《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翻譯文學卷》。知識產權。

【Jia, Z. F. (Ed.). (2010).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ong shumu: Fanyi wenxue ju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賈德諾（Gardner, E. S.）（1950）。〈歸輪風雨〉（微之譯）。《拾穗》，2，57—63。（原著出版年：1938）

【Gardner, E. S. (1950). *Gui lun feng yu* (Z. Wei, Trans.). *Shisui*, 2, 57-63.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8)】

福布斯（Forbes, K.）（1951）。〈慈母心〉（心漪譯）。《暢流》，4（10），60—62。（原著出版年：1943）

【Forbes, K. (1951). *Cimu xin* (Y. Xin, Trans.). *Changliu*, 4(10), 60-6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編輯部（1953）。〈讀者來鴻〉。《拾穗》，34，四。

【Editorial. (1953). *Duzhe lai hong*. *Shisui*, 34, 4.】

樽本照雄（主編）（2002）。《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

【Teruo, T. (Ed.). (2002). *Xinbian zengbu Qingmo Minchu xiaoshuo mulu*. Qi Lu.】

蕭（Shaw, I.）（1952）。〈不堪回首話當年〉（山隱譯）。《拾穗》，31，131—141。（原著出版年：1941）

【Shaw, I. (1952). *Bukan huishou hua dangnian* (Y. Shan, Trans.). *Shisui*, 31, 131-14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蕭義玲（2011）。〈「文化清潔運動」與五〇年代官方文藝論述下的主體建構——一個詮釋架構的反思〉。《臺灣文學研究集刊》，9，139—171。

【Hsiao, I. L. (2011). “The cultural sanitation campaign” and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for discourse of arts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50s in Taiwan: The introspection of interpretative schema.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9, 139-171.】

賴慈芸 (2014)。〈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台灣譯者生態初探〉。《翻譯學研究集刊》，17，59—91。

【Lai, T. Y. (2014). Ghost translators and exiled men of letters: A description of translators in post-war Taiwan.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7, 59-91.】

錢歌川 (1963)。〈譯事鉤奇〉。《晨光》，11 (1)，3。

【Qian, G. C. (1963). Yi shi gou qi. *Chenguang*, 11(1), 3.】

錢歌川 (1978)。《偷閒絮語》。大林。

【Qian, G. C. (1978). *Tou xian xu yu*. Da Lin.】

錢歌川 (1994)。《苦瓜散人自述》。中國華僑。

【Qian, G. C. (1994). *Kugua sanren zishu*. The Chinese Overseas.】

應鳳凰 (2003)。〈五〇年代文藝雜誌概況〉。《文訊》，213，28—34。

【Ying, F. H. (2003). Wuling niandai wenyi zazhi gaikuang. *Wenxun*, 213, 28-34.】

謝天振、查明建 (2003)。《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

【Xie, T. Z., & Zha, M. J. (2003).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1898-1949)*.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鍾欣志 (2022)。〈宋春舫的五四文壇地位及其對戲劇翻譯文學的影響〉。《清華中文學報》，27，269—323。

【Chung, J. (2022). Soong Tsung-Faung's position in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fiel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of dramatic tex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27, 269-323.】

關詩珮 (2014)。〈「徵求譯者！徵求譯者！」：鴉片戰爭譯者不足與英國漢學的起源 (1837—1851)〉。《國際漢學》，25，114—137。

【Kwan, S. P. (2014). 'The want of interpreters!' in the Opium War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ngland. *International Sinology*, 25, 114-137.】

蘇薇方 (2018)。《翻譯成功，譯介幸福：卡內基之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譯本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Su, W. F. (2018). *Translating success and happiness: A study on Dale Carnegie's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8hv935>】

英文文獻

Brande, D. (1936). *Wake up and live!* Arthur Barker.

Carnegie, D. (1932). *Lincoln, the unknown*. The Century Company.

Cather, W. (1923). *A lost lady*. Alfred A. Knopf.

Day, C. (1935). *Life with father*. Alfred A. Knopf.

Druett, J. (2011). *Tupaia: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captain Cook's Polynesian navigator*. Random.

Even-Zohar, I. (199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45-51.

Forbes, K. (1968). *Mama's bank account*. Mariner Books.

Galsworthy, J. (1918). The apple tree. In J. Galsworthy, *Five tales* (pp. 187-257). William Heinemann.

Gardner, E. (1938). *The case of the substitute face*. W. Morrow.

London, J. (2015). *The sea wolf*. Dover.

Maugham, W. S. (1922). *On a Chinese screen*. William Heinemann.

Maugham, W. S. (1936). A string of beads. In W. S. Maugham, *Cosmopolitans* (pp. 187-197). The Sun Dial.

Mitchell, W. (1924). Tiger-hunting in Indi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46(5), 545-598.

Pym, A. (2014).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Routledge.

- Shaw, I. (1941). The eighty-yard run. *Esquire*, 1, 23-35.
- Shelley, P. B. (1993). Ode to the west wind. In P. B. Shelley, *Ode to the west wind and other poems* (pp. 35-36). Dover.
- Snow, E. (1949). The black pearl. *Collier's*, 1, 32.
- Tinsley, F. (1950). Rubber fortresses for a-bomb defense. *Mechanic Illustrated*, 42(6), 82-85.
- Upson, W. (1927). I'm a natural born salesman.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9(42), 10-12.
- Venuti, L. (2008).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德文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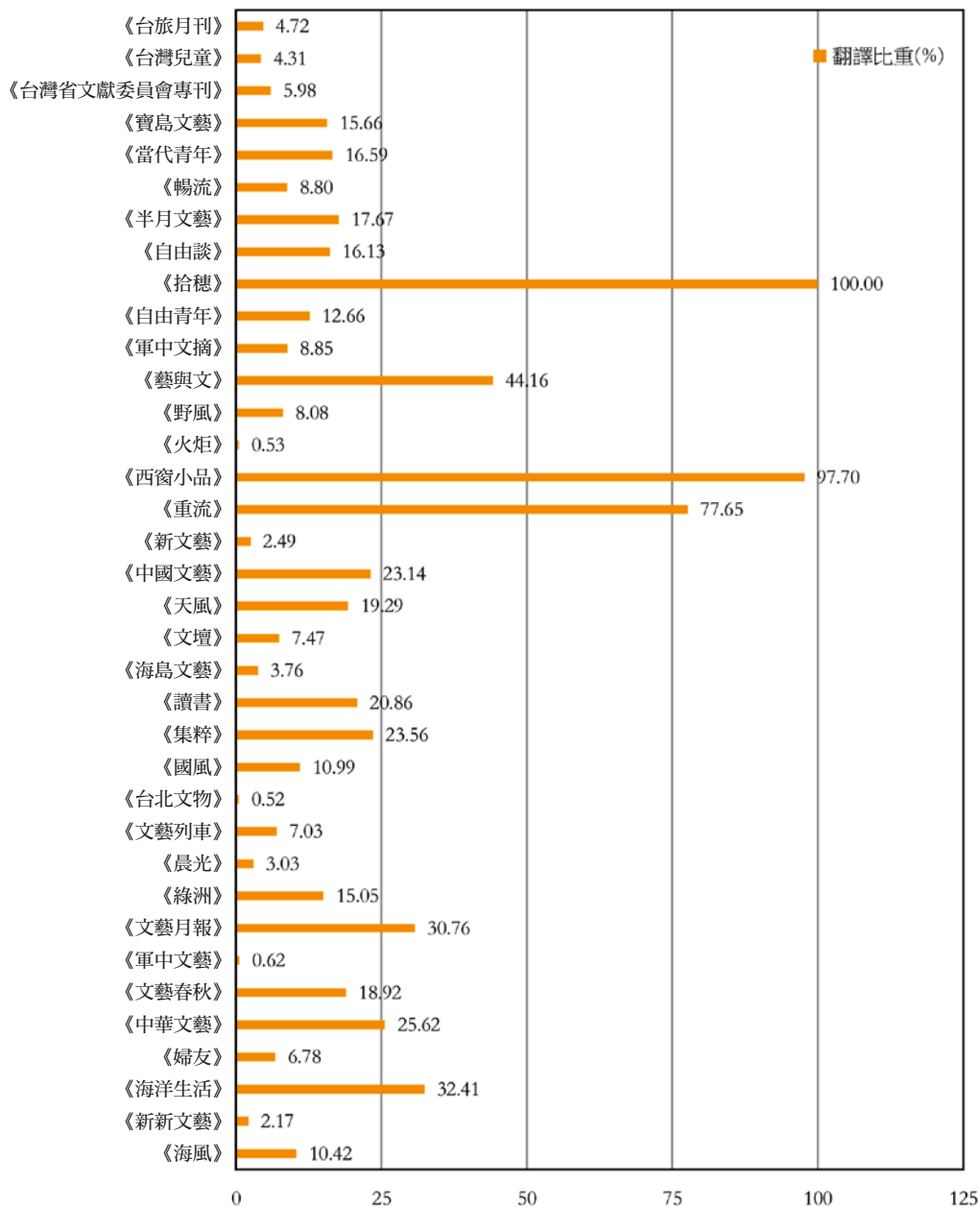
- Kästner, E. (1994). *Emil und die detektive*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Cecilie Dressler Verlag.
- Schnitzler, A. (1929). *Der blinde Geronimo und sein bruder* [The blind Geronimo and his broth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日文文獻

- 小野圭次郎（1949）。《新制英語の作文研究法改訂増補版》。小野圭。
 【Ono, K. (1949). *New English composition research method: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Kei Ono.】
- 舟橋聖一（1938）。〈木石〉。《文學界》，5（10），147—177。
 【Funahashi, S. (1938). Wood stone. *Literary World*, 5(10), 147-177.】

附錄 A

36 種雜誌的翻譯篇幅統計（按照創刊先後排序）



附錄 B

36 種雜誌的翻譯篇數統計（按照創刊先後排序）

